

序

黄 裳

十多年来，子善先生辛勤致力于新文学史料的发掘、考证、整理，成绩喜人。他搜集、编定了周作人、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等人的佚文，为读者提供了可读的文本，给研究者摊出了难得的资料，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他开手辑佚的工作时，周作人、梁实秋还是被排除在书林之外的“另册”人物，绝料不到后来居然会“热”起来，在不同意见纷起之时毅然从事，终底于成，不能不佩服他的胆识。周作人后半生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的，但作为新文化史上一个复杂的存在，研究者还是不能略而不论。要论，就要考查实证。在《周作人集外文》两卷中，就辑存了周作人自己删去的大量佚文，大致恢复了《真谈虎集》的本来面目，在读者和研究家看来，无疑是一种快事。对梁实秋作品的考订整理，也是子善先生用力甚勤的一个方面，有《梁实秋著译年表》为证。

中国过去有悠久的辑佚传统，曾蔚为文苑中的别国，如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就是一种名著，为文

学史家离不开的文献渊薮。继起者代不乏人。鲁迅先生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也都是人们熟知的。先生的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植根于《钩沉》的。基本史料与研究成果之间的紧密联系，灼然可见。鲁迅先生是自己动手收集素材的，因为前人没有留下可以凭依的资料汇编。这就给后人以启示，人们已经重视并着手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成绩是显然的，方向是正确的。这中间就有子善先生的劳绩。

前人进行古文献的辑佚，主要依据的是古典文献类书、总集。偶有细心的学者搜索广及地志、文集——如厉鹗的《宋诗纪事》，就为这一工作扩展了视野，是可以借鉴的方法。新文学辑佚工作所依据的则是报刊、杂志和单行著作，辅之以回忆录、社团史料等，其实还是大有扩展余地的。要达到知人论世的效果，是非把眼界更扩展到社会、政治的大环境不可的。本书中不少记述前辈与辨析史料的文字，就提示了这种研究扩展方向的可能性。作者所援引的书报杂志甚多，这些报刊的背景、倾向与当时作家的思想变化是息息相关的，都是可以进一步探索的课题。比如在 30 年代，梁实秋所用的笔名就有秋郎、陈淑、敬远、子佳等数十个，这就又有一个考定的问题，作者付出的劳动是可以想见的，往往一篇短文之成，作者不知翻遍了多少书报、杂志，而这些在今天又几乎成了“孤本秘籍”，残缺断烂，检索为难。作者埋头于资料的探寻中，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这是读者捧读这本《生命的记忆》时，难免会产生的沉重之感。

作者又是一位新文学书刊的收藏家。他曾记下历访北京琉璃厂、上海文庙书市的访书经历，读了恍如重睹北京厂甸书市风光。但其辛苦搜访的岌岌心情，却与“冷摊负手对残书”者迥异。偶然拾得一二珍异册籍，就亟亟写短文记之，流露出难

以掩饰的欣喜之情。他在北京无意中得到宋春舫褐木庐的藏书，就是这种奇遇。宋先生穷毕生之力搜集的 7800 册戏剧藏书，50 年代已捐赠给北京图书馆，但仍逃不脱狼藉市上的命运，真是言之痛心。不论长篇短制，作者记下的都是值得珍重的史料。子善先生年力正富，未来的收获正无穷尽，这是读者殷切的期待，也是对作者的鞭策。

1997 年 4 月 22 日

目 录

怀 人 忆 事

许寿裳手书鲁迅诗幅	8
刘延陵忆郁达夫	12
一个后辈的怀念	22
历历前尘吾倦说	30
我与夏公通信	40
琐忆胡风先生	50
台静农先生的两篇佚文	57
	61
叶圣陶先生的一幅未刊题签	10
人澹似菊，品逸于梅	18
悼念许钦文先生	27
盛成先生的一组抗日怀旧诗	36
赵景深先生对我的帮助	45
彭芳草自述生平及其他	54
遗憾与欣喜	61

我所知道的巴老二三事	64	
	69	施蛰存先生的贺年卡
马华新文学的拓荒者	72	
		钱钟书先生与我有关的几件事
	78	
遥祭李辉英先生	85	
	90	藏书家的遗憾
忆张向天先生	91	
	97	柳苏和周作人佚稿
为鲁迅刻名印的“刘小姐”	102	
	107	将国画与文学联姻的人
艺术天地任遨游	111	
	113	缘悭一面

长序短跋

《知堂杂诗抄》海外归来记	117	
	120	《知堂集外文》琐谈
周作人的《饭后随笔》	124	
	127	《周作人集外文》编后记
《上帝的儿女们》前言	132	
	137	《回忆郁达夫》编辑说明
《卖文买书——郁达夫和书》		
编后缀言	142	
	145	《台静农散文集》编后记
《梁实秋文学回忆录》		
编后琐语	147	

	151	《回忆梁实秋》前言
《也是人生》前言	155	
	159	叶灵凤《永久的女性》前言
《周越然书话》编者序	164	
	170	《刘半农书话》编者序
《〈申报·自由谈〉杂文选》		
编后记	172	
	175	学者散文的魅力
《捞针集》自序	178	

眉批杂议

	181	梁实秋的书评艺术
一个真实的梁实秋	183	
		开现代学者散文先河的
	186	叶公超
关于叶公超两题	189	
	192	凌叔华海外作品掇录琐记
“新月派”的后起之秀	195	
	197	爱书家的心声
说不完的张爱玲	199	
	208	笔名小考
宋春舫“褐木庐”藏书种种	212	
	215	观赵清阁捐献字画有感
台港散文八大家	217	
	233	跋（陈子善）

怀人忆事



北山樓藏書

许寿裳手书鲁迅诗幅

在鲁迅逝世 50 周年纪念前夕，笔者拜访李毓珍先生，高兴地发现了许寿裳先生亲笔所书的一幅鲁迅诗：《七律·为了忘却的纪念》。

许寿裳是鲁迅“几十年的老朋友”，他俩从 1902 年秋在东京弘文学院同修日语时结识起，直到鲁迅逝世，交往之密切，友谊之深厚，决非一般人所能比拟。鲁迅逝世后，许寿裳先后出版了《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书，为介绍鲁迅生平，弘扬鲁迅思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以致最后招来杀身之祸，至今仍使人深感痛惜。据闻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鲁迅研究专家林辰先生主编的《许寿裳文集》，以纪念这位中国现代史上知名的教育家、古典文学研究家、鲁迅的挚友。

许寿裳这条诗幅写于 1939 年 8 月，是应李毓珍先生之请而写的（李毓珍笔名余振，现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俄苏文学翻译家）。当时许寿裳在陕西城固西北联合大学任文理学院院长，李毓珍为该校法商学院商学系的俄语助教。由于在校长任命许寿裳接任法商学院院长问题上，激进派教授与保守派教授发生意见冲突，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违反自己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越权任命另一位法商学院新院长，从而引起西北联大师生的一场风潮，校长愤而辞职。这位新校长到任后，就无理解聘了拥护许寿裳的沈志远、曹靖华等六名教授。李毓珍不过是青年助教，因在这场风潮中站在沈、曹诸位一边，也难逃被

解聘的命运。他们离校前向许寿裳话别，并纷纷请他题字留念。许寿裳就欣然命笔，为李毓珍写下了陆放翁的一首七律和鲁迅这首诗。

鲁迅这首著名的七律作于 1931 年 2 月，系为纪念殉难的柔石等五位左联青年作家，鲁迅曾将其“录呈季市兄教正”（许寿裳字季市——笔者注）。许寿裳对这首诗很欣赏，他在《鲁迅的避难生活》中特地提到它，说：“全诗真切哀痛，为人们所传诵，郭沫若先生在抗战那年归国赋投笔诗，不是纯用这首的原韵吗？”在当时形势下，许寿裳把这首诗书赠涉世未深的李毓珍，恐怕也是有寓意在的。

许寿裳并不以书法名，因此他的字留传不多，手书鲁迅诗作也许更为少见。这幅鲁迅诗写得清劲、洒脱，特别是多用古字这一点，分明表现了许寿裳曾从国学大师章枚叔学习《说文解字》的遗痕，别有一格。

（原载 1986 年 9 月香港《明报月刊》249 期）

叶圣陶先生的一幅未刊题签

叶圣陶先生于2月16日溘然长逝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最后一位发起人离开了人世。这位《倪焕之》和《稻草人》的作者，辛勤笔耕70余年，著作等身。他在新文学创作上的杰出贡献，早已有人在研究评说，近年《叶圣陶评传》（陈辽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版）和《叶圣陶年谱》（商金林著，江苏教育出版社版）等书相继问世，用不着我再来赘言。我要说的是我欠了叶先生一段情，叶先生虽然已归道山，我仍深感歉疚。

5年前，我与王自立兄合编《回忆郁达夫》一书。书将编竣，我想到应请一二位与达夫先生有过交往的文艺界前辈题签，叶先生是我考虑的主要人选，因为他不但德高望重，而且二三十年代与郁达夫时相过从，在他主编《小说月报》和《中学生》杂志期间，发表过郁达夫好几篇作品，现存郁达夫1934年9月21日致他的信（见香港三联书店版《郁达夫文集》第九卷）就是两人友谊的见证。但当时叶先生已公开登报声明，由于年迈体弱，不再为人题词写字，怎么办呢？

我不敢贸然行事，只能拜托北京大学研究叶先生的专家商金林兄帮忙。金林兄为人热情，他通过叶先生二公子叶至诚先生为我诚恳相求。叶先生听说要为纪念老友郁达夫的书题签，

一口答应，他不顾眼花手颤，花了整整一个上午，认真书写了好几条，又剪贴多次，才挑选了这幅较为满意的托金林兄寄给我。

回忆郁達夫

叶圣陶手迹

叶先生这次破例挥毫，很可能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为人题写书名，五个字苍劲有力，十分难得。我自然是喜出望外，立即把它寄给出版社，要求他们印在拙编封面，把另一幅刘海粟先生的题签印在扉页，出版社当时并未提出异议。万没料到拿到样书一看，封面和扉页所刊均为刘先生的题字。惊讶之余，火速驰函出版社询问，始知因技术原因，没有使用叶先生的题签。这真是令人遗憾之极。叶先生对拙编一直关心，多次问起何时可以出书，待到书终于印出，他老人家的题签却弃之未用，叫我如何向他交代？想来想去，只能再请金林兄辗转说明原委，恳求谅解。尽管叶先生宽厚，没有责备我，但我总感到对不起他老人家。值此沉痛哀悼叶先生之际，把这幅未刊题签公之于世，作为对叶先生的一个纪念。

（原载 1988 年 4 月香港《明报月刊》268 期）

刘延陵忆郁达夫

1983年初，我与王自立先生合作編集一本《回忆郁达夫》，广约海内外与郁达夫有过交往的各界前辈撰文，意在为郁达夫研究保存若干重要的史料。远在新加坡的五四诗人刘延陵与郁达夫在星洲时期时相过从，自然也在被约之列。刘老不顾年事已高，极表支持，一口允诺。不料没过多久，刘老身体违和，一时难以完稿，万不得已，在7月12日致我的信中表示：“前承命写忆郁文，本乐予附骥。奈因俗事太多，屡次执笔愆期，实觉抱歉万分。迁延至六月底，决心拂尽琐务，一意属稿，且已草成数页，继续前进。不料忽患重伤风，寒热交作，卧床十日，今体温虽已如常，而咳嗽余波未尽，并且神疲力倦，无力构思，不知何日才能复原。如再求展期，固然没法启齿，且恐因此拖延尊书出版之日期，更加愧对”，因而提出豁免供稿的要求。我以为刘老与郁达夫的交谊，拙编缺少他的大作，未免可惜。恰巧当时也在新加坡的郑子瑜先生得知此事，就自告奋勇，于该年12月4日走访刘老，又根据刘老的回忆亲到新加坡虎豹别墅勘查，整理完成了一篇关于郁达夫的谈话纪录。但刘老翻读之后，在感谢郑先生之余，觉得还需再作补充修改，嘱我暂勿收入拙编。为尊重刘老本人的意愿，我只得照办，尽管不无遗憾。

这份纪录稿就这样在我手头一搁就是 6 年。去年 10 月 18 日，刘老在新加坡溘然长逝，噩耗传来，令人深感悲痛。今年 11 月上旬，郑子瑜先生来上海，我们谈起刘老对中国新诗运动的卓越贡献，也谈到刘老母校复旦大学的出版社有出版刘老诗文集的打算，我就想起了这份纪录稿。刘老晚年很少动笔，这份纪录稿虽然刘老生前未及修改，不能看作最后定稿，但毕竟是根据刘老口述整理而成，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仍然很值得重视。经与郑先生商量，不敢永藏私篋，决定将其公之于世，供海内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参考。刘老如果泉下有知，想必也会首肯的吧？

下面就是这份纪录稿的全文：

达夫先生和我同是五四时期的作者，他是创造社的健将，我只是文学研究会的一个小兵。他擅写小说、游记和旧体诗，风靡文坛数十年，我只写了几首新诗，凑凑热闹。也许是如叶圣陶先生所说的推理法那样吧，那时候的暨南大学负责人，以为我会写作必定会教书和批改习作，于是邀请我在暨大执教，这一教竟教了许多年。不幸我因为用脑过度，脑子出了毛病，不时发痛，医生劝我不可再教书，同时也应该少写作或是停止写作，理由是教书和写作，都要煞费脑力，会加重我的病情。又劝我最好从事于劳力多而劳心少的工作。这虽不至于宣布我的死刑那样可怕，却也是可悲的事。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作者，对劳动该是热爱着的，无如我到底是文弱书生一个，又怎能从事于劳力的工作呢？

然而我终于辞去了大学的教席，想找一份虽劳心又不太劳心的工作来维持生计，我自问对英文的读解能力还过

得去，于是立下决心，要在我的有生之年，从事中英文的对译工作。我以为这工作是现成而又有所依据的，不必像写新诗那样须着意构思自立天地，也不必像教书那样须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指批改学生的习作）。可是在那时候的中国，要找个搞翻译的差事也着实不容易，结果我在中日战事爆发之前，便独个儿渡海来到了马来半岛。

当时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华人聚居在这儿可以“夥颐”两个字来形容，要找一份翻译的工作，自然比在国内容易。可是，也可以说是机缘未至吧，我初到北马，却并不当翻译，而去做了几年中小学校长。校长只办行政，比较呆板，可以不必多费脑力，所以也算是能符合医生的指示，并不违背我的择业的准则。后来我进了星洲日报社编译电讯稿，始与达夫先生共事数年。

新加坡西海岸高地上的虎豹别墅，原是星系报业创办人胡文虎、文豹兄弟的产业，却开放让游客游赏。别墅中有一座名为“挹翠”的拱形石牌坊，两旁共有长短不齐的四支石柱，报社主人要达夫先生撰写两副对联，镌刻于石柱上，达夫先生稍一构思，便写成了。那较短的一副是：

天半朱霞，云中白鹤；
山间明月，海上清风。

那较长的一副是：

爽气自西来，放眼得十三湾烟景；
中原劳北望，从头溯九万里鹏程。

别墅中另有一座不题名的石牌坊，两旁各有一支石柱，达夫为它而题的对联是：

万水汇归，环海银涛收眼底；
金樽共赏，前山翠黛展峨嵋。

达夫先生曾将这十三字句的对联拿来和我推敲，大约也是出自“想当然耳”的推理法吧，他以为我会写诗一定懂得做对子，又一定可以替他的对子提意见和加以润色。自虎豹别墅俯瞰，是九曲十三湾的山坡小道，烟雾迷茫，这当是“放眼”的一句所出。下联可以看出达夫先生对祖国的热爱，以及缅怀过去，瞻望前程的情愫。依我的经验，作者拿他的作品来向你请教，有的意在炫耀自己的文笔，有的希望得到你的赞赏，若你真的提出意见，以为某句某字应该如何修改，那他准会愤然失色，拂袖而去。达夫先生可不是这样，他是真心诚意拿他的对子来和我推敲的，他衷心希望我能提出意见。我以为他这副对联实在写得确到好处，所以只有激赏，未提意见。他似乎感到不满足，这是达夫的虚心和诚实处。

达夫从不恃才傲物。没有和他共事的人，还以为他放浪不羁，凡事随随便便，草草率率。其实，他做事是何等的认真，多么的负责哩！我编电讯，每天下午六时到报社办公，深夜一时停止接收电讯，编辑竣事，已是二时光景了。回到家里（我那时住在俊源街，达夫住在中峇鲁路），往往直到四时才能入睡。达夫编副刊，每天几时到报社，我不大清楚，但我到了报社，他还没有回去。有一个时期，达夫兼任总编辑，须写社论，晚上就和我一样一直工作至深夜二时左右，看了大版，才得归去。他是真的把事情当作事情来办的，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的人，从来不会高自位置，而在这拜金主义挂帅的新加坡，人们看郁达夫不像个郁达夫，只有极少数的文化界人士，才会对他有几

分敬意，也特别看得起他。

达夫先生的爱国热情是经得起考验的。他对日本作家佐藤春夫原是十分敬佩，可是后来他得知佐藤春夫为文歌颂日本皇军侵华的所谓“圣战”，他对这位日本著名的小说家立刻由敬佩变成鄙视了，他写了一篇《日本的娼妓与文士》对佐藤春夫作了无情的抨击。有一天，我们报社有一位同事悄悄离职，到南京去参加汪逆精卫的伪政府，当了汉奸。达夫敌我分明，对他很是不齿，从此不再提起他的名字。

达夫常常向我打听祖国抗战的消息，如果是前线胜利，他便欣喜若狂，以为从此可以乘胜追击敌军，收回所有的失地，直捣黄龙，好让大家痛欢庆祝一番。若果是前线失利，或是敌军奸淫妇女，屠杀同胞的消息让他知道了，他便悲愤不欢，连续几个钟头。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有一天晚上六时许，他听到了他哥哥郁曼陀被日本特务杀害于沪上的消息，国仇与家恨相交织的愤慨之情溢于言表，他紧握着拳头说：“此仇必报！”充分表现了他的敌忾之气。

一九四二年二月，日军攻陷新加坡，英军不战而降，达夫在这之前的几天坐船到印尼避难。我逃到北马暂避风险，不久又回到新加坡，蛰居后港，日军发布告示限令居民依时集中检证，在检证中实行大屠杀，杀死十万人众。我没有去集中，也没有被发现（被发现必逃不出鬼门关），后来设法买了一张盖了“已经检证，属于良民”的护身符，才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而且由于多年来都做那不很费脑力的翻译工作，脑病也差不多好了。达夫却在一九四五年日军投降前夕，被日本宪兵杀害于印尼的苏岛，屈指一算，至今已三十八个年头了。

（原载 1990 年 6 月 21 日香港《星岛晚报·大会堂》）